

評 Christian Goeschel, *Suicid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xvi+247 pp.

樂羽嘉

史家柯伯(Richard Cobb)嘗言：「自殺是人類最私密也最難理解的行為」。<sup>1</sup>直到十九世紀，研究者傾向從病理學的角度將自殺原因詮釋為個人疾病，從而否定對自殺進行歷史性分析具有任何意義。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則反其道而行，以縝密的統計數字和理論論證，指出自殺不只是個人行為，更是歷史事件，而自殺率也和社會群體內部聯繫的強弱密切相關。因此，在他看來，自殺是超越個人的一種現象，社會群體的差異與自殺率之間有著因果關係。歷史學家拉斯雷(Peter Laslett)、安德森(Olive Anderson)等人都借用涂爾幹的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研究英格蘭的自殺。但穆瑞(Alexander Murray)、麥當勞(Michael MacDonald)和墨菲(Terence Murphy)等史家則發現涂爾幹模式太過聚焦於自殺的社會面，忽略了個人能動性和動機，無助於解釋自殺的脈絡。<sup>2</sup>2009 年倫敦大學歐洲現代史助理教授戈雪

---

<sup>1</sup> Richard Cobb, *Death in Paris: The records of the Basse-Geôle de la Sein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1. 轉引自 Christian Goeschel, *Suicid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

<sup>2</sup> 相關著作參見 Olive Anderson, *Suicide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ichael MacDonald and Terence

(Christian Goeschel)出版《納粹德國境內的自殺行為》(*Suicide in Nazi Germany*)一書，利用新近整理的史料、採取獨樹一格的研究取徑，重新剖析歷史上的自殺現象。戈雪採取中間路線，結合自殺的統計與文化面向、檢視社會結構和個人動機來回答：納粹德國社會是否存在一種廣泛的自殺趨勢？若有，則原因為何？

本書包含前言、結論、第一至五章。戈雪首先說明研究取徑、時空範圍、運用史料的性質及來源，回顧並批判相關領域既有文獻，闡明問題意識。第一章審視 1918 年德國戰敗以來威瑪共和時代自殺現象的變化，鋪陳納粹上台後對自殺的歸咎和宣傳。第二章討論 1933 年納粹掌權至 1939 年二戰爆發間，納粹對自殺的政治和社會論述如何形塑德國人對自殺現象的看法。戈雪將所有第三帝國猶太人的自殺現象放在第三章討論：由於猶太教教義、納粹針對猶太人制定的特殊法律和迫害，使猶太人的自殺情境和動機異於其他自殺者。第四章在時間上接續第二章，研究 1939 年至 1944 年二戰期間德國人的自殺動機如何受到戰情變化和政策修訂所影響。第五章觀察納粹垮台前後的自殺潮，與納粹高層如何詮釋這種自殺為「自我犧牲」。戈雪最後統整了前五章的研究發現，論證納粹意識形態如何造成德國社會的「失序」(anomie，即規範與價值被完全顛覆的狀態)，進而引發各種自殺。

戈雪首先從 1918 年革命所造成的劇變談起。威瑪年間，反共和者(尤其是納粹)宣傳各種迷思來攻擊共和政府，主張政治混亂、社會經濟困境導致自殺率升高，要政府為此負責。威瑪時代初期，社會達爾文主義廣泛流行，許多醫生、犯罪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從遺傳學和生物

---

R Murphy, *Sleepless Souls: Suicid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exander Murray, *Suicid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2000); 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New York: Scribner, 1973).

學的角度，把自殺歸因於遺傳、精神錯亂或神經病，而非社會經濟變化；大眾媒體則認為城市化、現代化、世俗化(secularization)、1918年戰敗、凡爾賽條約及通貨膨脹與越來越多德國人自殺息息相關。自殺率被立場各異的評論家用來攻擊他們所不喜歡的現象，如：女性解放運動、資本主義、社會原子化、都市化、年輕人鬆散的性道德觀、威瑪福利制度乃至威瑪共和的正當性。儘管當時一般人的自殺動機主要是失業、失戀、經濟困難、報復親人、領取保險金，自殺依然時常遭到「政治化」，被有心人士用來攻擊敵對團體、政黨或階級。

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前即承諾要透過減少失業率、撕毀凡爾賽條約、擴充生存空間、強化共同體和種族身體(Volkskörper)來終結自殺現象。納粹掌權後，嘗試修改德國刑法，把之前除罪化的自殺視為非法，並加重協助自殺者的刑責，宣稱自殺行為威脅到日耳曼種族的存續。納粹反對「個人有權自由處理其身體」，強調國家和種族對個人身體擁有最終處置權；但也鼓勵罪犯和「劣等人」自殺，免去納粹消滅他們的麻煩，表示這些人不值得納粹動手。然而，突擊隊(Sturmabteilung，即 SA)和精衛隊(Schutzstaffel，即 SS)內部卻不時傳出自殺，對此，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則表示「自殺是脆弱的行動，不適合國家社會主義者」，譴責納粹成員自殺是軟弱、疾病、害怕受罰所致，盡力對外隱瞞納粹成員自殺情事。納粹一反威瑪時期的宣傳，轉而將自殺歸咎於精神病和遺傳疾病以便撇清責任，並動員媒體宣傳「第三帝國已完全解決失業問題和經濟問題」。與此同時，有些人的「自殺」實際上是被納粹折磨至死，也有人自殺是為了保護同伴，避免被納粹拷問逼供而出賣朋友。此外，自殺也是遭受強制去勢時保持尊嚴的最終手段。

戈雪認為第三帝國猶太人的自殺有其特殊情境和特定模式可循，並在第三章集中討論這些情境與模式。戈雪使用迄今被忽略的史

料：猶太人的自殺遺書，解答猶太人自殺究竟是抵抗納粹的行為，還是絕望、無助的行為。《紐倫堡法規》的頒佈導致某些猶太人和其非猶太人伴侶一同殉情，也讓那些自認已同化、深愛德國的猶太人感覺受辱，為維護自身榮譽自殺，表明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死、控制自己的身體。許多自殺者不認同《紐倫堡法規》的標準，強調自己是德國人、具德國特色(Germaneness)，無視於猶太教的自殺禁忌。流亡中失散、年老無法移民的猶太人，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更傾向自殺。戈雪借用卡普蘭(Marion Kaplan)的「社會死亡」(social death)理論，描述猶太人漸漸被德國社會排除、邊緣化、汙名化、孤立、失去社會聯繫，被迫離開公共領域。當時由於《紐倫堡法規》、抵制猶太商店、德國合併奧地利、水晶之夜、強迫猶太人佩帶大衛之星和驅逐猶太人出境等事件，引發了數波自殺潮。戈雪強調，猶太人習以為常的生活、規範、價值因而受到顛覆，猶太機構如猶太會堂、學校、俱樂部也遭受破壞，迫使相信自己已被異化，無容身之地的猶太人決定自殺。猶太人在遺書中自白其孤立無援的感受，證明了納粹種族政策的確造成了德國猶太人的「社會死亡」，讓他們漸漸感受到被社會放逐，進而增加了他們自殺的可能性。

戈雪接著嘗試整理非猶太裔德國人的自殺因素，包括戰情、政治情勢、宣傳、健康因素，歸納出有別於猶太人的自殺脈絡和情境。根據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第三帝國宣傳部長)編輯的統計數字(現能取得關於1939-1941年間自殺情形的唯一統計資料)，德軍入侵波蘭後接連告捷，1940年的自殺率因國族認同的強化而短暫下降；1942年戰情逆轉、盟軍空襲德國後，自殺率不斷升高。由於盟軍轟炸造成德國平民家破人亡、破產、糧食短缺、營養不良，納粹政府也通過一連串防止惡意中傷當局的新法律，降低判處死刑的標準，加強控制社會，壓迫政敵、罪犯和反社會者，防止他們煽動叛亂。納粹任命新的司法部長干預審判，

處死更多罪犯，認為可以避免因優良士兵死於戰場而使優生學比例失衡。此舉破壞了德國司法獨立的傳統，也使司法成為納粹消滅偏差者的工具。此外，德國男同性戀者則在去勢或被關入集中營的威脅下選擇自殺。其後，1943 年史達林格勒戰敗更造成大量德國人自殺，原因是納粹在戰前進行反俄宣傳，將布爾什維克形容為次人(subhuman)、禽獸，入侵後將強姦所有女性。據警方報告，有些德國男性因而強迫妻女自殺，以免遭受俄軍玷辱。另外，當戰敗將近，無法承受壓力的德國軍人也常常自殺。

納粹高層對自殺有著弔詭的雙重標準，一方面譴責自殺士兵軟弱無恥、違背對民族的責任，卻讚許自我犧牲(Selbstaufopferung)。眾所周知，包含戈培爾、希姆萊在內，許多納粹高層於 1945 年跟隨希特勒自殺。他們認為自己並非自殺(Selbstmord)，而是進行了「英雄式」的自我犧牲，為軍人樹立典範。希特勒崇拜古羅馬將領引劍自盡的精神，其他人則視自盡為納粹和猶太教、布爾什維克戰鬥至死方休的表現，既可避開盟軍審判，也讓他們保留最後的尊嚴和榮譽感。戈雪從日記、報導、警方報告中發現很多德東居民隨時準備好氰化物膠囊和刮鬍刀片，以防被俄人玷辱。相較於納粹以死求解脫，德國平民面臨一種世界即將終結的絕望感，對戰爭的緊張、失去家產的沮喪、眼見城市被戰火蹂躪、情感和生活蒙受巨大損失，他們感覺到習以為常的道德、心理、宗教價值與規範完全崩潰瓦解，未來生活的目標也都被剝奪。戈雪藉由比較納粹高層與德東平民對俄軍佔領的態度，揭示 1945 年這波自殺傳染病中，不同自殺者的動機具有不同的層次，包括緊張、焦慮、沮喪的集體情緒，納粹戰爭宣傳的影響，或將自殺視為具美學意義的英雄行為，都應被納入考量。

戈雪提出一種結合微觀與宏觀視野的納粹德國新歷史，結合傳統社會史和文化史，在社會與政治脈絡下處理個人能動性、經驗、對自

殺的態度。他把自殺的個人態度和經驗放在更廣的社會政治脈絡中審視；並利用未出版的資料，挖掘出報紙和官方報告之外的故事，指出自殺並非只有經濟理由。對受迫害、驅逐的平民來說，自殺是維持尊嚴與能動性的最後手段。戈雪以許多自殺個案為證據，反駁一種流行的史學假設：一般德國人在二戰中大多同意納粹政權並與納粹合作。<sup>3</sup>他發現，納粹的支持者也面臨蓋世太保迫害，推翻了納粹報紙輿論強調德國人民與納粹合作愉快的說詞。他結合韋伯(Max Weber)的「卡理斯瑪」(charisma)和涂爾幹的「失序」(anomie)理論，說明第三帝國政治結構的崩潰如何造成那些內化納粹價值觀德國人的死亡，使自殺成為第三帝國的日常現象，也發現自殺不只是一種消極抗議納粹統治的方式。戈雪結合政治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自殺，從涂爾幹的四種自殺類型中特別提出「失序型」自殺來解釋第三帝國社會混亂與價值崩潰，指出個人世界裡規範和價值被顛覆是自殺的重要因素。為免涂爾幹重視社會力量忽略個人心理之弊，戈雪採取批判的態度來解讀自殺者留下的自殺遺書(suicide notes)，探討時人對自殺的認知，並運用地方統計資料、警方調查和媒體報導來填補自殺檔案之局限。戈雪對大量未出版的自殺遺書、地方警察和秘密警察的調查報告、書信、道別信、官方自殺管理單位和福利局的報告做了內容分析，細緻而完整地還原每一個自殺案例的發生過程。

戈雪發現，許多案件都未得到警方足夠的重視和調查。警方對他殺或自殺的判定，常因方法粗糙或受主觀認定所歪曲；對於死亡原因的診斷也常受到醫生、精神分析師、死者家屬經濟狀況的左右。戈雪恰如其分地扮演了史家作為偵探的角色，重建案發過程，兼從社會環

---

<sup>3</sup> 支持此假設的史家包括格拉特里(Robert Gellately)、許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等人，隆格利希(Peter Longerich)、伊凡斯(Richard J. Evans)則批判這種假設。

境的改變和私人的恩怨情仇推敲自殺者的困境，揭發納粹自殺論述誇大不實和隱瞞粉飾之處，證實德國人的自殺與日常生活環境被顛覆確有關聯。藉由文本分析，戈雪也發現德國人選擇的自殺字彙反映了他們的態度，例如 *Freitod*(自願死亡)較為正面，*Selbstmord*(謀殺自己)則帶有負面意涵；前者表達個人的能動性，後者暗示上帝握有個人生死的決定權。在量化分析上，戈雪的範疇包含年齡、性別、宗教信仰、城鄉差異、階級，他以統計數字證實天主教地區的自殺率較新教地區低，但他也認為天主教的自殺禁忌會讓教徒隱瞞自殺或喬裝成意外。戈雪又檢證「女性自殺率較男性低」、「年輕人自殺率較老人低」、「城市自殺率較鄉村高」等常見的自殺研究假設，發現階級和性別差異造成自殺者選擇不同的自殺手段。

從戈雪的分析理路可發現紮實的社會學傳統，從卡理斯瑪理論、佛洛姆(Eric Fromm)與鄂蘭(Hannah Arendt)對大眾社會的批判、人與人之間隔閡擴大的觀點，乃至社會死亡理論皆然。戈雪具有雄心壯志，試圖探討政治、戰爭、政策、意識形態、司法、階級、性別、社會、宣傳、媒體、文化等各層面對於個人自殺的影響；也細緻地探究各種自殺的定義和背後可能的真正原因，澄清許多自殺研究的迷思，為本領域研究做出一大貢獻。在研究方法上，戈雪兼備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的優勢，先以統計數字檢驗各種自殺命題的正確性，再利用內容分析說明該命題成立的可能原因和前提，達成交互檢證之效，讓讀者不會被大量統計數字阻滯思考能力，既能隨時進入作者編織的意義之網，又能和歷史情境保持一定的距離。另外，作者在時間與空間上示範了歷史研究如何協調社會學理論和史料、兼顧敘事和計量研究方法。

本書較為可惜之處有三。第一，戈雪無法在論證上超越涂爾幹，未能解決該理論應用於第三帝國產生的矛盾。《自殺論》清楚地說明了社會集體意識的削弱、縮減會造成社會的分崩離析，並假設易解體

的社會是個人主義社會。但是，第三帝國不但企圖以各種鋪天蓋地的宣傳強化社會集體意識，納粹政權在意識形態上也極力反對個人主義，試圖建立人民的共同體(people's community)來強化個人之間的聯繫。那麼，為何當時的德國還是會發生失序和崩潰的狀況呢？納粹的行動究竟對社會聯繫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涂爾幹認為世俗化造成神聖性和機械連帶被侵蝕，這符合納粹德國的情形嗎？納粹意識形態有沒有成功建立新的社會共識呢？戈雪並未嘗試修正、延伸涂爾幹的理論模型，來處理這個議題，實屬可惜。第二，戈雪未說明涂爾幹的另外兩種主要自殺類型：「自我本位型自殺」、「利他型自殺」是否適用於納粹德國人的自殺。德軍士兵為榮耀而自殺、納粹高層為領袖而死，是否算是利他型自殺？猶太人或外籍勞工與社會的聯繫過少，符合自我本位型自殺嗎？戈雪過度偏重失序型自殺，忽略了其他自殺模式，是為其盲點之一。第三，戈雪使用韋伯的卡理斯瑪模型說明第三帝國無法在希特勒死後繼續運作的原因，並與史達林俄國做出比較，卻未嘗試比較或以韋伯另外兩種權威類型說明史達林與希特勒統治模式與影響的差異。戈雪對卡理斯瑪式統治與第三帝國覆滅之間的關係說明太過模糊，導致論證的說服力不足，無法檢證韋伯理論是否適用於納粹德國。

除卻上述理論建構上的小瑕疵，本書的史料分析和理論運用堪稱精采。本書精確而合理地詮釋大量的史料，有組織地安排論點並穿插自殺者的自白，使讀者在統計圖表外也能看到自殺者自戕前的心境。總而言之，本書不僅論旨明確，更提供宏觀與微觀兼具的視野，方便研究者從各個角度觀察 1918-1945 年的德國，堪稱歷史社會學研究之新典範。

(本文於 2010 年 3 月 10 日收稿，2010 年 5 月 18 日通過刊登)